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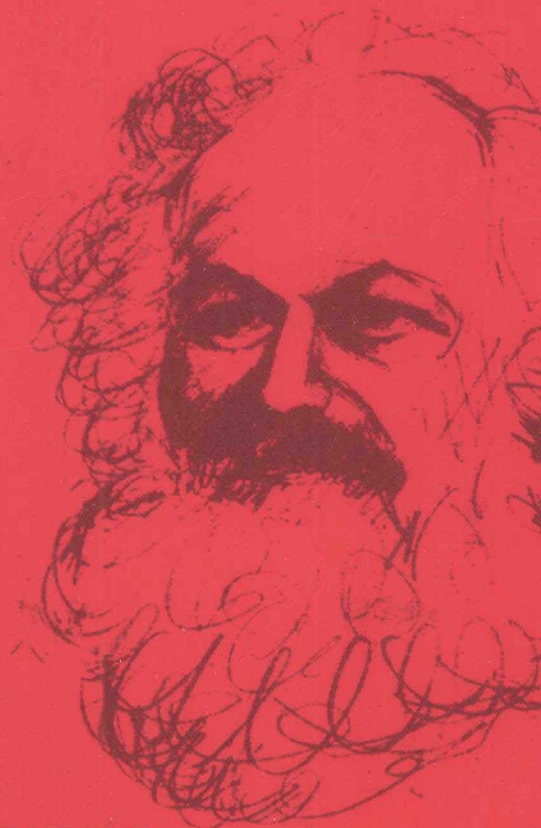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美]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著

郑吉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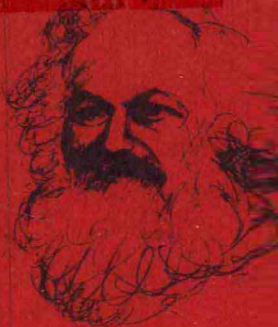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美]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著

郑吉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 (美) 布伦纳著; 郑吉伟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15323-0

I. ①全… II. ①布…②郑…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058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著

郑吉伟 译

Quanqiu Dongdang de Jingji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25 插页 2

字 数 424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自 2002 年问世以来，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愿意将自己的新作纳入丛书。为此，我谨代表本丛书编委会对各位尊敬的读者、作者、译者、出版者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工作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随着实践的迅猛发展，思想理论发展的步伐也日益加快。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断推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2004 年以来，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交相辉映，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理性。从国际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运用的普及，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如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全球社会治理、世界体系演进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国际学术界很多有识之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是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的关系、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研究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还从当代人类的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新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及其发展源流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对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为推进我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事业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我国近几年来理论研究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新作，译介给我国读者。其中，有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研究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规律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的未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有的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成果，如生态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等，可以给我们思考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启发。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这些作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08年3月28日于北京西单

中文版序言

当前世界经济的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我没有详细比较）最具有破坏性的，可以想象它的严重性已经接近大萧条了。这是因为它暴露出了几十年来由债务包裹着的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巨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暴露出了战后时期所没有见到过的金融陷阱。资本积累的不断减弱和金融部门的瓦解之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密切联系，政策制定者必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它的存在明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这次危机的分析者自然将金融部门和证券市场的崩溃作为其出发点（这也是“地震”的震中）。但是，从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到后来的一些人（很少有例外地）都坚持这种做法。他们现在承认这场危机是严重的，尽管到现在危机已经扩展到了金融部门以外的部门，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应在金融部门里寻找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初在金融部门的危机是孤立的。相比之下，经济的基础是稳固的，不存在问题。在2008年3月，保尔森在次贷危机（the subprime crisis）之前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我们有六年的非常稳固的经济增长。”^[1] 拿伯南克来说，他从2004年开始宣传“伟大的现代化”的思想，即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特别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不断完善，经济更稳定，通货膨胀降低，经济表现良好，前景光明。^[2] 在2008年9月，此时金融市场处在崩溃的边缘，保尔森提出他的庞大的银行救援的计划，200位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其中的许多人来自哈佛、芝加哥和麻省，包括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封公开信中警告国会：“尽管它们出现了麻烦，但是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私人资本市场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根本上来

（通过政府干预）削弱这些市场来平息短期动荡的行为绝对是短视的。”^[3]这确实是当前正统的观点，或者说至少过去如此。但是，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具有误导性了。

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在过去30年里一个经济周期接着一个经济周期地衰退，直到现在这个水平。资本积累和总需求长期下降的根源在于资本的回报率在体制范围内的大幅下降，并且没有得到恢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仅仅如此——源于全球制造业长期存在过剩产能即过度供给。从1973年长期衰退开始，经济当局通过更大规模的信贷（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从而支撑需求来延缓在历史上困扰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危机。但是，它们得到暂时稳定的代价就是停滞在加深，因为债务的增加和无法消解的过剩产能使经济对刺激计划越来越不敏感。1993年的克林顿政府以及后来的欧盟试图打破这种债务依赖，承诺要平衡预算，但是这个目标到20世纪90年代末也没有实现。经济似乎可以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解放出来，通过万能的市场来推动发展。但是，这种巨大转变暴露了这个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的停滞、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深层问题像以前一样束缚着它。由此导致的需求下降使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1991—1995年间进入到战后时期最严重的周期性衰退之中，充分表明这个制度缺乏动力，为一系列的重要金融危机的发生打开了大门——从日本，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再到墨西哥和巴西。

为了“止血”和保证增长，美联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转向了日本经济当局在10年前类似环境下首先使用的解决办法。公司和家庭（而不是政府）通过大量借贷和透支性支出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些是由它们纸面上的财富的历史性增加而推动的，纸面上的财富又是由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和后来的低成本信贷而推动的。私人透支（不管是公司的还是家庭的）替代了公共赤字。整个过程的关键是美联储最终担保的推动资产市场的不断增加的廉价借贷。

结果是形成整个后来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削减投资导致企业对信贷需求的大幅下降。东亚国家政府不断购买美元资产（dollar-denominated assets），旨在压制它们的货币的价值，提高它们的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不断提供贷款来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所以，长期借贷的实际成本在逐步下降。同时，一出现危机的征兆，美国中央银行就通过降低联邦基金利率（the federal funds rate）来确保短期利率不会高到危及在金融市场获取利润的程度。人们因此会看到世界经济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即资本积累持续下去已经发展到了依赖一波接一波的历史性的投机浪潮，这些投机浪潮由国家政

策的制定者和规制者来精心呵护和公开合理化——首先体现在 1995—2000 年间的资产泡沫，以及在 2000—2007 年间的住房和杠杆信贷上。对高盛（Goldman Sachs）——不再是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

从 1996 年起用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asset price Keynesianism）来替代呆板老套的凯恩斯主义，这给人的印象是（像其前辈一样）不能改变这个制度走向经济衰退的趋势。但是，它只能使这个制度暴露在危机之下。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推动了艾伦·格林斯潘的“新经济”繁荣，引发了一波巨大的自战后长期繁荣以来从未见到过的投资和消费浪潮。但是，到 1998 年夏天，随着美元的上值和东亚出现危机，美国经济扩张的脚步开始停滞不前，因为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和股票价格都在下降。第二年秋天，人们会看到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衰退发生了，这成为当前崩溃的一个预演，世界经济似乎走向深度的周期性衰退之中或者更恶劣的衰退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大幅度利率下降和放松信贷的其他措施，美联储成功地渡过了这次危机，证券市场的泡沫重新恢复，经济得以支撑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它不能阻碍这个制度在 2000—2001 年间走向严重的衰退，这个美联储主席吹嘘的信息技术股票的历史性崩溃使这个经济失去了它的主要动力即失控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表明了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难题再一次不断恶化，表明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借贷来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而这些需求又是通过不断上升的资产价格来推动的。

经济本身的脆弱性现在又拯救了经济。1997—1998 年间和 2000—2001 年间世界经济的一系列危机导致公司对贷款资金需求的大幅下降。东亚的主权资金仍然通过包揽美国国内和贸易的赤字来推动美国创纪录的刺激计划。长期利率继续下降，为新一轮的泡沫经济（bubblenomics）提供基础，这一次降落到住房和杠杆贷款上。抵押利率大幅下降，推动了住房价格和房地产财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增长。住房贷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推动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的增长，而这些又使经济好转直到扩张。但是，甚至到 2003 年，私人投资、就业和出口都没有达到 2000 年的水平，尽管存在房地产泡沫扩大所引起的财富效应的有力刺激，更不用说布什政府的“里根风格”的预算赤字。另外，抵押市场已经达到顶点，因为人们能够买得起住房的能力在面对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时也开始削弱了，很快威胁到家庭纸面上的财富的上升，所以经济扩张也面临威胁，当然，这又一次表明经济不能根据自身的动力来推动其本身的发展。

正如在 1998 年，形势需要美联储进行大胆的干预来使投机增加、泡沫再

次膨胀和经济增长起来。美联储这两年送的大礼就是实际短期利率下降到零以下，同时它决定允许抵押贷款标准出现历史性的下降——更不用说追求利润的贷款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张——从2003年起为出现次级抵押贷款的突然而大幅增长创造条件，而次级抵押贷款为住房价格上涨和周期性扩张的持续提供了可能。即使如此，更加令人疑惑的是，如果能够找到足以让这些不确定的贷款提供充足资金的贷款者，并且能够保持扩张的势头，那么长期利率也不会这样持续下降，长期利率的最初下降推动了住房繁荣，但也会使金融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并且住房的繁荣会驱使投资者热切地寻求更高的收益。正是证券（其背后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支撑）带来的收益率提高的幻象，导致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地方政府和世界范围的银行大量购买次级抵押贷款，从而支撑证券市场，而这最终为次级抵押贷款提供资金，从而使房地产泡沫扩大。这次全球借贷市场上空前的投机被证明是保证实体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

它证明经济在实际上如何失衡。尽管在美国实施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刺激计划——该计划由重新产生巨额的联邦赤字和创纪录的家庭借贷来推动——但是，与亨利·保尔森的意见不同，美国从2001年到2007年的经济周期是战后时期最脆弱的周期，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糟糕。当住房泡沫在2006年失去推力时，实体经济由于本身具有波动性而依赖于不合格贷款（nonconforming mortgage），就不可避免地滑向衰退了，同时，金融部门原先由于不合格贷款而支撑起来的高估值资产而忘乎所以，现在这些资产的价值也迅速下滑。住房价格减少了家庭的财富、消费需求和金融机构的资本，一场由实体经济下降和金融部门恶化相互作用的严重衰退就发生了。

导致严重的周期性衰退或进一步演化为制度上灾难性的危机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甚至内部人也如此）的金融部门的发展——也就是“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的兴起。根据华尔街的忠实拥护者的观点，信贷市场的狂热实际上不会使这个制度面临危险，因为经济在信贷上所依赖的大银行将其发起或购买的抵押在形式上进行证券化，并且卖到很远的国家和更大的范围，将风险分散到数百万的相互隔绝的投资者手中。但是2007年8月信贷链条的破裂很快就表明，现实正好相反。为了应对困扰着金融部门的不断激化的竞争和回报下降——以及华尔街惊人的贪婪和过度自信——美国最大的金融房地产公司力图继续支配它们根据或者超出资产平衡表而发行的大部分抵押所支撑起来的金融工具，并且这些金融工具通过短期信贷市场为同样的资产提供资金。所以，当住房价格快速下滑，并且通过“发起—证券化”（originate-and-securitize）的机制展开来时，很多这样的机构发现它们

失去了资本，无法取得信贷，事实上进入破产状态。这似乎是公正的，但存在例外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企图将自身与他们自己的公司的命运分开，惨重的损失首先重重地落在工人阶级和次级抵押产品的少数购买者身上。

金融市场的衰退削弱了银行向公司和家庭提供资金的能力，它们在此时面对住房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而突然收紧它们的贷款标准。根据这种方式，它大大加快了暴露在实体经济中的消费、就业和利润的危机，这又加速了由住房不动产和住房抵押所支撑起来的证券价格下降，进而导致金融部门的崩溃更加具有灾难性。但是，信贷供给的下降最终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和家庭不能得到它们所需要的信贷，而且是它们不会或者说不可能需要这些信贷。公司不进行任何投资，也不雇用工人，因此不会在整个产业周期中为了扩张而进行借贷。面对需求崩溃和利润下降，人们怎么会企望它们从现在开始投资呢？家庭在过去的7年里通过大量借贷、消费和住房投资而拯救了经济。但是，面对房屋价格急剧下降，并且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债务，而劳动力市场又低迷，人们怎么会企望家庭会重新借贷和消费来重新开始拯救经济呢？经济面临着自我强化的极其残酷的向下的恶性循环，市场信号在这种循环中告诉私人企业和家庭尽可能地收缩开支。不仅政府阻止这种衰退的愿望将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而且其阻止这种下滑的能力也将受到考验。

注 释

[1] “All Things Considered,” NPR, interview with Melissa Bloch, 13 March 2008.

[2] See Ben S.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Remarks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20 February 2004, and “The Benefits of Price Stability,” 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24 February 2006, both at Federal Reserve website.

[3] “Economists Against the Paulson Plan: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24 September 2008.

致 谢

我非常感谢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计划给予大量学术和道义上的支持，对我的书稿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同时，也要感谢马克·格利克 (Mark Glick)、安德鲁·格林 (Andrew Glyn) 和鲍勃·波林 (Bob Pollin) 慷慨地奉献了他们辛苦得来的数据，向我解释如何运用这些数据，对多种图形发表意见，花费大量时间和我讨论诸多经济理论和数据，从而大大提升了最终成果的水准。我还要感谢戴维·戈登 (David Gordon)、约翰·阿什沃思 (John Ashworth)、戈帕尔·巴拉克瑞施南 (Gopal Balakrishnan)、迈克尔·伯恩斯坦 (Michael Bernstein)、萨姆·鲍尔斯 (Sam Bowles)、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吉姆·戈罗宁 (Jim Cronin)、杰勒德·杜梅尼尔 (Gérard Duménil)、萨姆·法伯 (Sam Farber)、鲍勃·菲奇 (Bob Fitch)、迈克·戈德菲尔德 (Mike Goldfield)、洛伦·戈德纳 (Loren Goldner)、迈克尔·霍华德 (Michael Howard)、多米尼克·利维 (Dominique Lévy)、拉斯·梅乔塞特 (Lars Mjøsset)、乔纳森·摩西 (Jonathon Moses)、约翰·罗默 (John Roemer)、鲁恩·斯卡斯坦 (Rune Skarstein)、迪克·沃克 (Dick Walker) 和埃里克·赖特 (Erik Wright)，他们仔细地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批评。我还要感谢罗宾·布莱克本 (Robin Blackburn)，他在通读了最初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上的本书初稿之后给予我耐心的、友善的、支持性的和实质性的批判。感谢史蒂夫·克恩 (Steve Kern) 和朱利安·斯托拉布拉斯 (Julian Stallabrass) 在改进本书风格和提高表述清晰度方面给予的广泛帮助，感谢戴夫·胡思 (Dave Huth) 仔细研究大量数据并教我如何使用它。我

特别感谢苏珊·沃特金斯 (Susan Watkins) 在最近通读了全部书稿, 并对形式和内容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为本书的完成铺平了道路。约翰·罗杰斯 (John Rodgers) 在数据的收集和计算这一枯燥但又不可或缺的任务方面, 给我提供不断的帮助和合作, 这些计算要求将不同国家和多个部门的利润率收集起来。我非常感激他的无私相助。由汤姆·佩恩 (Tom Penn) 领衔的维索 (Verso) 出版社的团队 [包括帕特·哈珀 (Pat Harper)、索菲·斯卡贝克-博罗斯卡 (Sophie Skarbek-Borowska) 以及安德烈亚·斯廷普森 (Andrea Stimpson) 在内], 以高度的专业水准, 通过制作过程加工了复杂的文本, 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塞巴斯蒂安·巴詹 (Sebastian Budgen) 从头到尾编辑了文本, 在提高它的形式和表达上做了大量工作, 为此我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汤姆·默特斯 (Tom Mertes)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各种方式为我提供帮助——数据的收集、风格的改进、内容的批判、思想上的建议等。他的帮助和支持对于我完成这个研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仅用“感激”一词是不能充分表达我的心情的。我最应该感激是特里·埃德加 (Teri Edgar), 她不仅从开始时就以各种形式向我提供帮助, 而且一直坚持在向成功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奉献着她的爱。

出版者说明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首先是在《新左派评论》1998年5~6月号总第229期关于世界经济的专刊中发表的；出于风格改进或表述更清晰的原因在这里进行部分修订。书中的图表都进行了更新，尽可能采用修正的数据。前言和结束语都是新的内容，两个附录也是如此。

序言：动荡的机制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演化自然分为两个大致相等的阶段，每一阶段大约持续了 1/4 个世纪，即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1973 年的繁荣时期，以及 1973 年开始的增长下降和经济越来越动荡的时期，其标志就是衰退越来越严重和自大萧条以来没有出现的可怕的金融危机又出现了。《全球动荡的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对这个轨迹——战后的繁荣，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从高涨到低迷的转变，以及后来的长期低迷进行一致的解读。长期低迷——经济动力下降和经济表现下滑的长期阶段，持续到旧千年结束，并进入到新的千年——首先是本书所试图解释的。

理论与历史

对战后发展的演化过程进行系统阐述的困难是明显的。从根本上说，问题在于提出一致的框架，从而能够马上阐述这个制度总体上的重要转变——一系列阶段，这些阶段在增长类型上彼此都不同——并且具有地区差异——积累出现多极化，并且在政治经济上相互分离。我们需要的是将理论与比较历史融合起来，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现有解释的苍白使这项研究更困难，同时，正统经济学的失效使这种解释的不充分性更加严重。后者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其均因缺乏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而无法解决上述问题。现在的另一些重要的解释最初有正统和异端两种看法，是在劳动反对资本的权力和压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探讨从繁荣到低迷的根源，这本身就是战后经济复苏长期扩展的部分结果。^[1]这一观点得益于后见之明，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期间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严重弱化而又不能恢复整个制度的经济活力的情

况下，它肯定也受到质疑。无论如何，我在下面将对它进行广泛的批判，以便为阐述我自己的解释打下基础。

我对战后经济进行理论—比较历史分析从而切入问题的方式是分析利润率的实现途径。已实现的利润率是衡量公司从其工厂、设备和软件中取得剩余的能力的直接途径。它也是一个公司对新投资的预期回报率的最好警示。所以，利润率是一个经济的构成要素，即公司积累资本和扩大就业的比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所以它也是产出、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决定因素，反过来又是总需求（不管是投资还是消费）增长的决定因素。从这一点出发，立即回到最初的阐述。使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出现战后繁荣并持续很长时间的因素就是利润率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之后得到提高并在随后的20年中持续下去。引起战后繁荣终结的因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65—1973年间的利润率单独地和集体地大幅下降，这种下降集中在制造业，然后扩展到整个私人经济，并且从美国开始，然后扩散到西欧和日本。正如2000年，全球经济没有明确性的复兴是因为整个利润率系统没有确定性复苏，或者，对于美国、西欧及日本等经济体应分开考虑。当然，这些结果所提出的挑战是需要阐明利润率本身的模式——不仅是整个体制上，而且包括各种地区和国家——同时阐明这种模式如何解读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不仅在全球经济层面上，而且在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层面上。简言之，回应这种挑战是本书的目标。

简单地说，我的解释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在最基本层面上，我阐述一个能够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机制。这个机制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作为起点。这些要求单个的资本通过引进包含更高效率技术的固定资本来降低成本以便生存下去，但是这样做不仅没有考虑到其他资本再生产的需要，而且威胁到它们的利润，事实上也威胁到它们的生存。一方面，生产集中的结果是带来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生产集中使那些具有高成本的生产方法固化在已经存在的工厂、设备和软件中，企业因此不能实现它们的固定资本投资。这表现为过剩产能和利润率下降。

为了将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抽象阐述与战后经济演化的具体轨迹结合起来，我构建了它们之间在概念上的联系。以固定资本的推动力为基础，这种概念设想资本扩张采取不均衡发展形式，因为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早期发展的资本集团最初在技术和社会经济上更发达，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后起的资本发展集团起初在技术和社会经济上落后，在政治上处于屈从地位，但是，它们是能够利用后发的潜在优势和在不发达地区形成的新的优势。出发点是假定投资在相互联系的固定资本配置中以波

浪式或以集团形式出现，其组成部分包含着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结果是出现以下假定的发展模式：早期发展的资本集团在较长时期内倾向于支配自己的市场，阻止挑战者；新出现的资本集团，受到更早的集团的排斥而不能进入它的市场，通过开辟新的地区和剥削新的劳动力与更早发展起来的集团相隔离来获得利润；最后，后发展起来的集团的资本通过将更低成本的投入和同样或更发达的技术结合起来，挑战那些更早的发展集团，导致相互间资本竞争的激化，削弱了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自我实现的能力，进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

当然，这种概念框架的最终目标是使得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阐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演化的框架成为可能。我认为，在第一个战后的2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可以描述为不均衡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不同经济的利润率沿着上述路径下降，其原因在于大资本集团的固定资本不能实现价值。只有早期发展起来的在美国的资本集团与后来发展起来的资本集团之间在美国的支持下形成有力的合作关系，高利润率和经济繁荣的再生产才会成为可能。美国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本集团的特征是技术领先，更发达的社会经济演化，以及它的国家和资产阶级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西欧和日本后来发展起来的资本集团的特征是技术追随，受到阻碍的社会经济演化，以及相关国家和资产阶级受到霸权支配，最初在很大程度上与早期的发展集团相分离。后起的发展集团通过其经济统制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产品这一具有重商主义倾向的方式最终保证了它们的动力；更早发展起来的集团通过自由市场、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化导向以及金融的国际化来实现它们的影响力，从而实现其国家在国际上的支配地位，更不用说它的军事主义与帝国主义。

但是，这种综合体的扩展和深化最终被证明是一种自我破坏。在1965—1973年间，更早的和后起的发展集团的生产者最终进入国际竞争激化的状态，这种国际竞争通过形成一种不断递增的使价格降低的压力，使得现存的固定资本中很大部分都无法保持自身价值的稳定。随之产生的过剩产能引起整个体制性的利润率下降，这集中在国际制造业部门，但是也吞噬着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私人经济（不管是单个的还是总体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致使世界经济从长期繁荣走向长期衰退。

当然，如果用上述的机制来解释长期衰退的发生，那么它也进一步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长期衰退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鉴于存在这样的事实——在随后的25年及更长的时间里，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更为自觉的、体制上的和全面的努力，通过降低成本首先是直接和间接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改变其经营的方式来恢复利润率——这个问

题变得更迫切了。它们发起了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更恶意的攻击以限制其发展，在一些情况下也降低了补偿^①和社会服务水平。它们通过使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使以前受到压制的金融部门自由化，从而使全球经济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同时迫使不发达国家开放商品、外国直接投资、金融服务和短期资本的市场。它们使资本从低成本、低利润的制造业进入到金融服务业，越来越转向投机。它们推动了外国直接投资，以重新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部署制造业，目的是将廉价的但技能和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与最可能的技术结合起来，同时企图通过热钱在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中流入和流出在南半球地区获取利润。实际上，所有这些相互联系的降低成本、新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的措施——解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不断增长的政策紧缩——构成了或多或少的更热切的解决利润率下降的普遍的、持续性的问题的企图。但是，压倒一切的不是恢复经济活力，这些措施不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表现不再恶化。所以，到2000年，长期经济衰退并没有得到缓解。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以及结束语中，我企图阐述这些过程并解释长期衰退令人意想不到地持续下去的原因，我会集中解释我所认为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私人部门的利润率没有恢复，首先是由于国际制造业中周期性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在这里，我试图同时阐述和扩展我解释长期繁荣和长期衰退时所构建的框架，集中关注固定资本与不均衡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一方面，公司为了应对利润率下降，被迫降低投资和就业的增长，同时力图以前面已经阐述的各种方式降低它们成本的增长和水平，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在利润率不能恢复的情况下，结果是投资、消费、政府支出以至总需求的周期性恶化。另一方面，与预期相反，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公司只缓慢地、极不情愿地从生产领域撤回资本存量以应对它们的利润率问题。相反，它们只要有可能就会通过尽其所能地扩大投资来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以保住它们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甚至是在面对回报率下降的时候。同时，东亚的一个又一个地区——从东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the North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ICs），到东南亚小龙^②，再到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进一步扩大了不均衡发展，利用与后起者西欧和日本同样的后发的潜在优势，抵消了长期衰

① 这里主要指工资。——译者注

② 英文原文为“the Southeast Asian Little Tigers”，根据文化差异和习惯说法，这里译作“东南亚小龙”。——译者注